

三上文库·西方文化译丛

(第一辑)

⑦

学术与政治

[德] 马克斯·韦伯 著
冯克利 译

FROM MAX
WEBER

BY
WEBER.M.

外文出版社



Weber, M.

C. W. Mills From Max Weber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1976

《三上文库》
编纂委员会

主 任

车吉心 冯德英

主 编

何 明 吴开晋

编 委

王利明 冯克利

乔 伟 庄德钧

刘乃昌 齐 涛

吴富恒 何 丽

宋云峰 张 毅

周立升 孟祥鲁

徐经泽 蒋维崧

译 序

德国社会学思想大师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名子,对我国的读者已不陌生,他的多部著作,包括著名的《儒教与道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以及《经济与社会》等,均已有中译本行世。这里呈现给读者的,则是他在去世前不久的两篇著名演说,它们是韦伯在德国战败后,应慕尼黑一个青年学生组织之邀发表的即兴演说,后由韦伯据速记稿做了修订,以小册子形式出版,并立刻在德国知识界引起一场重大争论。

这两篇学说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韦伯在这里触及到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文化问题,它们大都同“现代化”这一过程有关。当时的欧洲,在思想界因尼采和柏格森等人的影响,支撑着科学进步的理性主义精神已成颓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是引起了人们对西方文明之“进步性”的深深怀疑。作为一个心智敏感的思想家,韦伯自然不会回避这些问题。在这两篇给青年人的讲话中,他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讲述了信仰已在职业(即技术化分工的结果)中消失的无耐现实。他认为,现代世界,科学和信仰、职业与理想,已不可能保持一致。在这样一个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处于分裂状态的世界里,韦伯告诫年轻人,一切拯救信仰的努力都是虚妄

的,他要求他们本着“科学的诚实”,以“责任伦理”的态度对待生活,努力做到“头脑的清明”。而往昔作为一种共同体精神的宗教,只能是一种欺惑人心的神秘主义,或变成完全放弃世俗责任的空谈。因此一个诚实的教师,也不应在课堂上宣讲信仰。他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以客观的态度,讲明不同的信仰所导致的结果,而将选择留给每一个人自己。

韦伯在当时德国的思想界,是一位公认的“知识贵族”式的人物。从精神上说,他十分眷恋往昔自然法主义的时代,但理智告诉他那样的生活已一去不返。在这个已遭除魅的世界里唯一可能的道德生活,就是按照职业伦理的要求,负起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因此我相信,对于正生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我们,韦伯不但没有过时,甚至比许多当代人更能切近我们的生活。七十多年前,中国曾有一场丁文江和张君勱挑起的“科玄之战”,其根由便是对两分科学之功用发生了怀疑,它所引起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可以说至今我们也未能很好地解决。就此而言,韦伯的睿智和困惑,对于我们的思考,无疑的有巨大的启发意义。

译者

1998年9月

东方国际书局

《三上文库》编纂委员会

中国·济南

经四路 269 号·东图大楼

www.oicd.com.cn

oicd @ sd.sti.ac.cn



三 上

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厠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谢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立厠，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余因谓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厠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

宋·欧阳修

《归田录》卷二

目 录

译 序	(1)
-----------	-------

以学术为业的意义

一、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	(1)
二、学术工作中的机遇和灵感	(8)
三、理智化的过程	(14)
四、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	(20)
五、学术与政治	(23)
六、价值的多元性	(25)
七、教师不应是领袖	(29)
八、科学对信仰所能做的贡献	(31)

以政治为业的意义

一、政治的定义	(39)
二、支配权的类型	(42)
三、近代国家和职业政治家的出现	(47)
四、以政治为业的方式	(51)
五、专业官吏的兴起	(55)
六、职业政治家的来源	(61)
七、新闻工作的地位	(67)
八、政党的经营	(72)

-
- 九、英、美、德三国的政党…………… (79)
- 十、德国职业政治家的现状…………… (90)
- 十一、以政治为业的含义…………… (93)
- 十二、政治和道德的关系…………… (99)

附录一

- 韦伯的科学观 …… 海因里希·李凯尔特(116)

附录二

- 科学的职业…………… 埃利希·冯·凯勒尔(128)

附录三

- 社会学和世界观的形成 …… 马克斯·舍勒尔(141)

以学术为业的意义

一、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

诸位希望我来谈谈“以学术为业”^①这个题目。

① 韦伯这篇演讲题为“Wissenschaft als Beruf”，这个题目所包含的两个十分普通的德文词，无论对于讲汉语者还是讲英语者，都会带来一些理解上的麻烦。“Wissenschaft”一词一般译为“科学”。由于它是从“wissen”（有“知道、懂得、理解”等义）而来，所以凡是以追求“系统知识”为目的的认知活动，都可被德国人称为“某某科学”。由此造成的一个问题是，有些学术领域，在英语世界里冠之以“科学”（science，它的来源是拉丁语“sciretia”，原义为“分割”、“辨别”、“区分”）是要很慎重的，在德语中却显得十分自然，在传统的“人文学科”（在现代英语中，“人文学科”（humanities）这个词的含义之一，恰恰就是为了与“科学”相区别）中，德语便有“艺术科学”（Kunstwissenschaft）、“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的说法，换成中文，在我们听起来便很不习惯。由此可见，德文的“科学”，含义要比英语或我们所说的“科学”更为宽泛，它几乎可将所有“学术”活动都包括在内。从这个词在韦伯演说中使用的情况看，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取其“自然科学”的含义。我作为附录译出的当时三位学者的讨论文章，其中的用法基本上也是如此。鉴于此，以下译文中对这个词的处理，采取了两种办法：当韦伯是在谈近代自然科学，我将它译为“科学”，如果他是在说一般的学术活动或古代的知识，我便将它译作“学术”。

比较起来，“Beruf”比“Wissenschaft”还要更麻烦一些。在现代德语中，这个词的含义，除了我们所说的“职业”，还有一层不十分常用的更崇高的含义，即“天职”。“Beruf”的这两层含义，交替出现在韦伯的这篇演讲中。对于“职业”一义，我们不需要多做解释。至于它的第二层含义，韦伯在著名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一书中，曾对马丁·路德的“天职”观做过深入的分析。他认为，路德将天主教放弃世俗生活，视为一种逃避责任的自私行为，从而为教徒对现世生活的经营罩上了一层宗教色彩，每个人的“职业”也成了上帝安排的事业，为获得“救赎”所必须。（详见该书第三章：“路德的‘职业’概念”，尤其见韦伯为这一章所写的二十多条词源学性质的注释。）“Beruf”一词的这两层含义，给翻译这篇演讲带来不少问题。韦伯在下面谈论“学术职业的外部环境”时，基本上是取第一层含义，即一般我们所说的“职业”，而在涉及到“科学的献身精神”和“终极价值关怀”时，“Beruf”的两层含义往往同时出现。我在题目上以“以……为‘业’”来处理这个词，或许淡化了这种词义上的差别，好处则是中文这个“业”字也有一层宗教含义，它同佛家所说的“业报”联系着，因此将现世与来世之间搭上一层“因果”关系。在正文中，我基本上将这个词译为“业”或“职业”，个别地方译为“天职”。

我们这些政治经济学家^① 往往有一种学究式的习惯,总是从问题的外部环境讲起,我也打算照此办理。这就意味着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以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今天这个问题的实际含义就是,一个决定献身于学术作为职业的学生,他的处境如何?为了了解我们这里的特殊情况,对照一下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会对我们有所助益。这另一个国家,就是在这方面同德国形成最鲜明对比的美国。

大家知道,在德国,一个有志于献身科学的年轻人,要从“编外讲师”(Privatdozent)开始做起。在征求了相关专家的意见,又得到他们表示同意的保证后,他以一本著作和一次系内的考试(这通常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做基础,可获准在大学里担任一名编外讲师。然后他会在他被允许教课的领域里选择一门课程开课。不过除了学生的听课费之外,他并无薪水可拿。而在美国,学术生涯通常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他先被任命为“助教”。这大体上类似于德国的自然科学和医学机构里发生的情形,在这些地方,只有一部分助理人员能得到编外讲师的正式职位,而且这种任命经常蹉跎来迟。两国间的这种差别,在现实中表现为德国学术职业完全是建立在金钱支配(plutocracy)的前提上,因为一个并无钱财以抵御任何风险的年轻学者,在这种学术职业的条件下,处境是极其危险的。至少在几年之内,他一定得有维持生计的能力,同时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否谋得一个收入可观的职位。而在美国,却

^① “政治经济学家”的原文是 Volkswirtschaftler——“国民经济学家”,考虑到这个词在我国已不甚流行,我据英译本,将它译成“政治经济学家”。

存在着一个官僚体制,年轻人从一开始便有薪水,尽管这薪水相当微薄,一般来说比一名半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多不到哪里去。但他看上去确实是以一个稳定的职务为起点,因为他有固定的收入。不过就像我们这里(科研机构)的助理人员一样,他有被解雇的危险,不管他有什么其它想法,如果他有负期望,他得常常做这样的心理准备。这些期望包括他得让学生来塞满他的课堂。德国的编外讲师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他的处境是,职位一旦到手,谁也无法让他离开。当然,他不能提出任何“要求”。但是他怀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期待,只要工作若干年之后,他便拥有某种道德上的权利,让别人对他有所考虑。甚至在是否任命其他编外讲师的情况出现时,这一权利也同样适用——这一点往往是很重要的。是否从原则上说应当任命所有那些能力已得到证实的学者,还是给予“教学代课人员”以优先权,换言之,让现有的编外讲师得到教学的垄断权,是一种令人苦恼的困境,这同学术专业的双重性有关,稍后我们还会讨论这个问题。人们通常决定作出后一种选择。然而,由此也增加了这样的危险——有关的教授,无论他多么审慎,多么端正,他都有可能偏爱自己的学生。我要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一贯恪守的原则是,在我这里做第一篇博士论文的学者,他要想取得私讲师的资格,还必须获得另一所大学某位教授的同意。结果是最能干的学生之一,却被一所大学拒之门外,因为没有人相信我的理由。

德国和美国的另一个差别是,在我们这里,一般来说编外讲师的讲课比他希望的要少。原则上允许他开设自己学科范围内的任何课程,不过(如果他这样做了)这会被认为是对较年长的编外讲师缺乏恭

敬。按照常规,是由教授来开“重要”课程,编外讲师将自己限制在开次要课程上。这样做的好处是学者在年轻时有做研究的自由,尽管这未必是出于自愿。

美国的制度与此有基本的差别。讲师年轻之时,也必定是他超负荷工作之时。正教授只要开一门三小时关于歌德的课就够了。可是年轻的助教,如果在一周 12 课时之中,他被要求教一些如乌兰德这类诗人的课程,并反复向学生灌输德语,他就很幸福了。系里的官僚计划课程表,而助教,和德国研究机构里的助理一样,得依赖这些官僚。

如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学术系统中许多领域最近的发展,也有着与美国相同的趋势。大型的医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是“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企业,如果没有大量的经费,这些机构是难以运转的。就像所有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这里也出现了同样的发展:“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工人,即助理,完全依靠国家配备给他使用的工具。这样一来,他对机构负责人的依赖同工厂雇员对经理的依赖并无不同。机构负责人信心十足地认为机构就是“他的”机构,处在他的掌握之中。因而助理的位置和“无产阶级”或美国大学助教的地位一样,常有朝不保夕之虞。

德国大学在一些重要方面,就像德国的一般生活一样,正在变得日益美国化。我相信,这一发展终将侵入那些研究者个人仍然拥有工具(同过去工匠的情况一样)的学科,这里的工具主要是指个人藏书;我本人的学科大体上依然属于这个范围。现在这一发展却已成蔓延之势。

无可怀疑,就像所有同时伴有官僚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这一发展的确有它技术上的优点。但

是它的主导“精神”，却与德国大学的历史氛围不合。无论就表象或真实情况而言，这些大型的资本主义式的大学企业，其首脑与标准的旧式教授之间，都被一道不寻常的鸿沟分离，他们甚至在心态上也是如此，对于后面这种现象我不拟在此讨论。无论从表面上还是从本质上说，旧式大学的构成方式已徒有其名。唯一仍然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的，是大学职业制度所独有的一种因素。一个讲师，更不用说助教了，他是否能够升为正教授，甚或当上学术机构的首脑，纯粹是受着机遇的左右。在这里，运气当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它确实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我几乎无法想象还有哪个行业，运气在其中起着这样重要的作用。我尤其可以说这样的话，因为我在相当年轻的时候便被聘为一门课程的正教授，我将这归因于纯粹的运气，而在这门课程上，我的一些同龄人无疑取得了比我更多的成就。基于这一经历，我相信自己有足够锐利的眼光，可以看出许多人不该有那样的命运，他们的才干不在话下，却无法在这种遴选制度中获得应有的职位。

机遇，而不是才干，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这个事实并不是只同人的因素有关，甚至主要不是由这一因素决定的。在学术选才的过程中，就像任何其它选拔情况一样，这个因素的出现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把众多平庸之辈无疑在大学扮演重要角色这个事实，归咎于教授团体或教育主管本人的失败，却是不公正的。这是人类合作，特别是若干组织间合作的规律中所固有的。这里所涉及到的合作，是发生在有推荐权的教授团体和教育主管之间。我们可以利用教皇的选举来比较一下这个过程，就与学术选才的性质相似而言，这种选举是最重要的可控

制的例子。一个被人“看好”的枢级主教，他的成功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名列第二或第三的候选人当选已成为通则。美国总统的选举亦是如此。一流的或最出众的人得到党代表大会的提名，不过是一些例外情况。通常都是排名第二甚至第三的人得到提名并进入大选。美国人已经为这些候选人的类别创造出一些社会学名词，通过研究这些例证，找出集体意志选择的规律，会是件十分有趣的事。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这些规律在大学中同样成立，令人奇怪的倒不是错误频频发生，而是尽管如此，正确的任命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可以有把握地说，只有在议会出于政治原因对选举进行干预的国家，让人放心的庸才和投机分子才会占尽便宜。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同此前的德国相同的国家，那里的君主们出于同样的原因进行干预，这同如今德国的革命者们所做的一样。

大学教师中谁也不喜欢回忆那些有关聘任的讨论，因为他们很少有愉快的经历。不过我可以说，在我所了解的无数事例中，毫无例外地存在着真诚的愿望，要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

进一步说，大家必须明白，如此多的学术前程操于命运之手这个事实，其根源不仅在于集体决定这种选拔方式的不恰当。每一位受着感情的驱策，想要从事学术的年轻人，必须认识到他面前的任务的两重性。他不但必须具备学者的资格，还得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一个人可以是一名杰出学者，同时却是个糟糕透顶的老师。

我想让诸位回想一下像赫尔姆霍兹和兰克^① 这些给我上过课的人,在这方面他们的情况并不少见。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大学,尤其是规模较小的大学,都十分荒唐地热衷于竞相招徕学生。大学城里的房东们用节庆方式迎接着千名学生的到来,如果是两千名学生,甚至乐意为他们举行一次火炬游行。能够“聚集门徒”的相邻学科的一次任命,对讲课费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人们应当公开承认的。此外,听课者的多寡,可以对能力高下做统计数字的检验,而学者的素质却是难以测算的,遇到勇于创新者的情况,他便时常会成为(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争议的对象。几乎每个人都为慷慨应允之类的建议和听课者众多的好处所诱惑,说某某讲师是个很差劲的教师,通常等于宣判了他的学术死刑,即便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但是他作为老师的优劣这个问题,是由决定赏光来听他课的学生人数决定的。目前的事实是,某些纯粹表面的因素,如讲师的性情,甚至嗓音的感召力,决定着学生是否涌向某位教师,其程度要比人们所能想象的更大。在获得了还算广泛的经验,又做了冷静的思考之后,我对那些门庭若市的课程深感怀疑,尽管这种现象可能难以避免。民主只应当用在适当的地方,而德国大学传统中所实践的,是精神贵族式的学术教育,对此我们无须讳言。的确,以恰当的方式将科学问题呈现出来,使一个未曾受学但具备领悟力的头脑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继而能对它们进行独立的思考(对我们来说这是

^① 赫尔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 1821 - 1894), 19世纪德国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在生理学、光学、数学和气象学方面均有突出贡献。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 - 1886), 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以注重民族文化特点的史学观闻名于世。

唯一重要的事情),大概是教育事业中最艰难的任务。但可以肯定的是,一门课程门生众多,并不能决定这一任务是否已圆满完成。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教学技巧乃是一种个人天赋,它并非一定会与学者的学术素质相吻合。同法国相比,我们没有“不朽院士”的科学机构^①,按照德国的传统,大学应同时对研究和教学的要求做出裁判。但是将这两种才能集于一身,却纯粹是靠运气。

可见,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如果年轻学者请教一些做讲师的意见,对他给予鼓励几乎会引起难以承担的责任。如果他是名犹太人,我们自然会说“*lasciate ogni speranza*”(放弃一切希望)^②。你对每一个人都要凭着良心问一句: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当然每一次他们都会回答说:“自然,我只为我的志向而活着。”但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我想,有关学术生涯的外部条件,必须予以说明的也就是这些了。

二、学术工作中的机遇和灵感

不过我相信,诸位实际上还希望听点别的什么内容——对学术的内在志向。今天,这一内在志向同作为职业的科学组织相反,首先便受着一个事实的制约,即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

① 这个“科学机构”指法兰西学院,由路易十四的重臣黎世留创立于1634年。该院自成立至今,始终保持40名终身职的院士,死一补一,永不减少,故有“不朽院士”(immortals)之称。

② 语出但丁《神曲》第三章,原文是“进入这里(指地狱)的人,放弃一切希望”。

种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凡是涉足相邻学科的工作——我这类学者偶尔为之,像社会学家那样的人则必然要一贯如此——人们不得不承认,他充其量只能给专家提出一些有益的问题,受个人眼界的限制,这些问题是他不易想到的。个人的研究无论怎么说,必定是极其不完美的。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因此任何人,如果他不能给自己戴上眼罩,也就是说,如果他无法迫使自己相信,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在眼前这份草稿的这一段里所做的这个推断是否正确,那么他便同学术无缘了。他绝不会在内心中经历到所谓的科学“体验”。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这全看你能否判断成功,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

不过事实却是,这热情,无论它达到多么真诚和深邃的程度,在任何地方都逼不出一项成果来。我们得承认,热情是“灵感”这一关键因素的前提。今天的年轻人中间流行着一种看法,以为科学已变成了一个计算问题,就像“在工厂里”一样,是在实验室或统计卡片索引中制造出来的,所需要的只是智力而不是“心灵”。首先我得说明,这种看法,表现着对